

高大梧桐树掩映下的绍兴路，光影斑驳，暖风熏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各个编辑部门就在这年代久远小洋楼的一扇扇玻璃窗里，亮闪闪透露着几分神秘，也浓厚积淀着多少文艺出版的情感故事和精神传承。那时，每逢周二，两位退休已久、白发苍苍的资深编辑，就会出现在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室，因为志同道合、心心相印，也因为彼此对于文学事业与人文精神的深切热爱和关心。

绍兴路的美好时光

修晓林

悄无声息的编辑部，李济生和宫玺先生面对面深情凝视，手中是几篇急于相互推荐阅读的好文章。李济生，巴金先生的胞弟，是编辑，也是作家、翻译家，浑身都是川人的爽快气息。宫玺，是诗歌编辑也是著名诗人，向来崇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为人处世禅境。他俩既有古代文人潇洒自得、知足常乐的魏晋风度，又有现代学士敢于担当、淡泊名利的洒脱风范。在我刚走上编辑岗位的时候，济生先生就对我说：“编辑要好好读书，不读书，就会搞不懂很多事情。有的人浮躁，不想下功夫，没出息。要读鲁迅，读沈从文。读书，一辈子的事情啊！”宫玺老师对我说：“生活的感受是第一位的，是最新鲜的，是别人不能代替的。”

两位学识深厚、将自己半生岁月都奉献给出版事业的编辑老师的对话，使我了解到不少，领悟到许多——“文化，不仅是多读几本书、多考试几次，关键是人的道德修养。经济可以几十年搞上去，而文化，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精神氛围。”“不要文化怎么行？马克思能够影响世界，就是因为他有高度的文化，有世界的眼光。”“贾植芳的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精彩，幽默，书是借来的，我是恨不得把它抄下来，但是太长，不抄吧，又怕记不住。”

年迈前辈们在一起，定然会有关于

老年生活的种种体会——“真是没有办法，一年不如一年了。”“自己老得不像话了，看都不能看了，从来不照镜子。已经是不久于人世了。”“老人，活得开心最重要，活得长、死得快就好。”李济生和宫玺先生，有中国文人的傲骨，但无傲气。他俩的共性：喜欢读书和思考，有着相同的追求：文事、家事、国事、天下事萦绕于怀，以天下为己任，以道德为第一。彼此的深厚情谊在言谈举止里，碰撞出闪亮的智慧之光，双方“所见略同”的欣喜之情，在各自的心胸激荡起温暖的涟漪。老李的川音抑扬顿挫，宫玺的语调沉稳细腻；老李谈事，慷慨激昂、嗓音响亮，而宫玺则是面带微笑，条分缕析、层层递进；两人都在走过苦难、迎来辉煌的叙聊中，引发无限的感慨和由衷的赞叹。

上海文艺出版社荣获茅盾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的优秀图书，就出自于这个编辑室。房间里还有五位文学编辑在审阅和编发书稿。两位文化老者激情四溢的高谈阔论和心声交流，常常吸引他们旁听而“停工”，这真是那段时间绍兴路上这幢楼房里引人注目的亮丽景观。

这已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现今的李济生先生，已是103岁高龄，卧床不起，再也不能够握笔写字；宫玺老师也已是88岁了，体衰无力，行走艰难。年岁不饶人，晚年多无奈。作为后辈后学的我，有时会入神回想思念那段令人留恋的美好时光。

在学识、为人、编辑能力方面，我都从两位先生身上受教许多。为了文学出版事业，他们一生为他人作嫁衣裳，无处不自得潇洒的工作态度，观世事笑沧海、视荣华为浮云的思想境界，会一直伴随我的人生之路。

龙门石窟在北朝曾被记为“伊阙石窟寺”，因为它开凿在伊水两岸的山崖上，形如

龙门天阙

璇儿

天阙。郦道元《水经注·伊水》引陆机语：“东严西岭。并镌石开轩。高龛架峰。”从这样简洁的记载中，依稀能够一瞥千年以前伊水东西两岸石窟开凿的盛况。我们已经无法确切知道千年前，最初北魏迁都洛阳时的龙门石窟是什么模样，时光流转间，佛像已风化，但如今的龙门石窟在整个气势和整体构造上，依然保留着最初的面貌。伊河自东西两山间穿过，狭窄如门阙，两岸石窟鳞次栉比，绵延数里，灿若繁星。毫无疑问，龙门石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依托山水之势而修建的构思可谓天人合一，与中国三大石窟中的大同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具有完全不同的特质。

这是一条相当完整的佛教文化传播路线，来到洛阳龙门石窟，中国化的进程终于有了飞跃式的发展，造像终于开始摆脱印度犍陀罗式的影响，开始大规模地以浮雕与线刻的形式进行表现了，源于印度支提窟的中心柱窟也在龙门石窟退出了舞台。龙门石窟造像不再崇尚充满力量感的肉体，而是与中国传统的较为含蓄的审美合流了。龙门石窟的造像，不管是作为过渡的古阳洞，还是规模较小的民间造像，服装大都呈现出重重叠叠的视觉效果（除了皇家造像的宾阳中洞仍然具有较强烈的云冈风格），那些悬空坐的造像衣裾云朵一样的堆积几乎可以称之为繁复。

实际上，我们大约可以认定佛教文化在我国境内以西域龟兹（今新疆拜城县）克孜尔石窟为起点，经河西石窟（以敦煌莫高窟的北京窟为代表），又因为北魏对黄河以北包括河西地区的征服，出现了其首都平城（今大同）云冈石窟的辉煌高峰，最终又随着北魏政权光宅中原的进程迁都洛阳，以最早有纪年可循的古阳洞为发端，伊阙石窟寺，即今天的龙门石窟工程拉开了帷幕。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改变，正如我们常说的，龙门石窟的造像整体具有“秀骨清像”的特征——绝非这么轻描淡写的四个字可以概括，其中那漫长的本土化进程足以让任何一个研究者感慨。而作为游客，在震撼于龙门石窟集天地造化以及匠心独具的壮丽与雕琢之美的同时，也会感慨万千——毕竟经过千年风化和毁灭性的盗窃行为，完整的洞窟已经不多见了。但这绝不会让龙门石窟的光彩损耗一分一毫，站在把东西山一分为二的龙门桥上，那感觉仿佛是穿越了时空的洪流，最终来到了这里。从龙门石窟开始，造

像不再藏在洞窟深处，它们展露在天空之下，既是接受人们的供奉的佛龛，也凝聚着人们的祝愿。

北魏迁都洛阳是开凿龙门石窟的机缘，也是中国化的极致，经东西魏和北齐的发展，最终在唐朝再次达到极盛，留给了我们龙门石窟艺术的最高峰——奉先寺大像龛。正中卢舍那佛满月一样的面庞，是印度犍陀罗式——中国式秀骨清像——印度风格再次回归并与本土审美的完美融合，在龙门石窟，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进程的最终呈现，并为其艺术魅力而震动。

“卖野人头”是上海俚语，词义大致有二：1.商业上的以假乱真，以次充好。民国胡祖德《沪谚外编·新词典》：“卖野人头，以劣质之物品，向人求善价也”；《沪谚外编·三百六十行》：“近来此术已识破，卖野人头无顾客”。2.以虚张声势、夸大事实的方式吓唬或蒙骗他人，如上海人批评对方夸夸其谈时会说：“依讲的比唱的还要好听，啥人勿晓得依辣辣‘卖野人头’，又没有人相信依囉”。

据说，“卖野人头”出自上海“十里洋场”的商业。《点石斋画报》是中国第一份关注时事、以图配文的大型综合性画报，1884年5月8日创刊，附《申报》发行，1898年终



朝颜 (插画) 慢慢

折扇，古谓之“折叠扇、聚头扇、撒扇”，一般由竹木或牙骨、韧纸或绫绢合制所组成的可折叠之扇。其随身怀袖，携带方便；其扇面书画，扇骨雕琢，为文人雅士出入时往往携之而相伴；又别称“怀袖雅物”，以及“并面、便面、障面”等。其品种有纸折扇、象牙扇、贝壳扇、檀香扇、孔雀翠羽扇等。

折扇以纸质为最普及。此扇是以细长骨片叠起，下端头部以钉铰固定，其余则可展开为半圆形，上用特种纸张裱糊而成，并在扇面上题诗作画。扇骨以棕

罢，起身取洋烛引火照，近人头即被吹灭。听其声，似上海左近口气。余故短于视者（我的视力不好），而自驻足以追退出，为时不

美国人“卖野人头”

薛理勇

美国人赁屋一幢，门前插标，大书“新到美国野人头，有头无身，供人观览”。余于假日，亦逐以往观。入内，帷幕重重，虽日中（大白天），亦设灯；室之半，遮以栏，游人至此，不再进。栏内设琴一座，离琴台丈许，即高置人头处也。头之上下左右用红布遮满，适中处嵌玻璃一方，由外视内，空洞无物，意盖示人以无身者。西人鼓琴一曲，曲

及一刻。虽心知其为赚钱之戏，无甚奥妙，不足推敲，然既属新闻，詎不可图之以供世之未曾目睹者。现代人又不习惯读半文半白的文章，我简单翻译如下：有一个美国人租下福州路第一楼茶室对门的门面，门前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新到美国野人头，有头无身，供人观览”，吸引了无数上海人争相观瞻，美国人每天有大批的进账。

有记者前去打探。进入室内，四周被帷幕重重相围，还设有栏杆，游客不能超越栏杆，在帷幕的高处有一个玻璃盒子，野人头就放在玻璃盒子里，户内的光线昏暗，人们看不清玻璃盒子里的野人头，外国人拿蜡烛靠近玻璃盒子，蜡烛瞬间被野人头吹灭了，乍听起来，这个野人头还略带上海附近地方的口音。记者猜想，这一定是骗人的把戏，可是记者是一个近视眼，无法看清其中的奥妙，只好把场景画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人才弄明白这个美国人的“野人头”只是外国人利用西方科技和工艺制作的一个人头模型，并非真正的“野人头”，上当受骗的人越来越少，“卖野人头”的生意清淡而退出市场，卖野人头

的美国人溜走了，上海留下了“卖野人头”的俗词俚语。清末上海环球社出版的《图画日报》“营业写真”专栏还绘有“卖野人头”画，配文说：“野人头，没来由，药水玻璃四面兜。只见人头不见人身体，野人开口声啾啾。近来此术已识破，卖野人头无主顾。哪知世间别有野人头，骗人卖脱无其数。”郭友松，松江娄县人，家居松江方塔东。13岁中秀才，同治十二年科举，已写53岁。他有以松江方言写的《玄空经》稿本传世，该书共八回，全书仅16000字。《自序》说，该书写于“光绪甲申”，即1884年，当时已经年满花甲。《玄空经》第七回有这样一段话：俗话佛金装，人衣裳，脱皮少爷走出来绸披披，山青水绿，卖野人头，倒亦可以取得人信；实底里是月亮里点灯空好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文中的“卖野人头”与上海俗词俚语的“卖野人头”的词义完全一样。《点石斋画报》的美国人“卖野人头”绘于1885年左右，而松江人郭友松《玄空经》写于1884年。看来，如今难以知道，“卖野人头”一词本来就是上海方言词汇，还是《点石斋画报》的记者写的这个“美国人卖野人头”的故事，让这个俗词俚语流行起来。

吴方言有“maoya”一词，没有规范的写法，通常根据读音写做“冒野”，词义与“卖野人头”相近，如某人指责对方说：“依勿要‘冒野’了，啥人勿晓得依诡计多端，卖野人头，我才不会上依个老当”。清胡文英《吴方言考》卷九：“扬子（即汉朝大学者扬雄）《方言》：‘以大言冒人曰奔。’案，大言，伪言也，如欲知其意之然否，先与言凡事大概，以观其意之所存也。吴中谓以言诱人自露其情曰‘奔’。吴方言‘冒野’的发声与‘卖野’很接近，也许，上海话所谓的“卖野人头”就是“冒野”的“衍生产品”，谁知道呢。

可见他非常注重舆论宣传。

为了重申《北上宣言》，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政治态度，孙中山决定邀请媒体记者，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媒体座谈会。1924年11月19日下午3时左右，他邀请沪上各报刊、通讯社记者，在寓所集会。席间，孙中山与众人谈笑风生，叶楚傖、邵元冲等也参与座谈，并代为招待茶点。茶点之后，孙中山向记者发表了演说。这次招待会直至下午5时

一次记者招待会：重申《北上宣言》

卢荣艳

20分告结束，孙中山与各记者握手道别。孙中山在演说中强调：“这次单骑到北京去，就是以极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要开一个国民会议，用全国已成的团体作基础，派出代表来共同组织会议，在会议席上公开地来解决全国大事。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他还希望得到

媒体记者的帮助：“惟冀报界诸君，有以鼓吹之，使民众趋于一致。”

孙中山的演说经过媒体的广泛宣传，在社会各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各团体、商会等纷纷发表函电予以支持。据报道，仅上海就有56个团体发出函电支援孙中山的主张。当日，中国共产党也发表对时局宣言，支持孙中山召集国民会议以解决国是的主张；国民党人在《向导》周刊上撰写评论，对孙中山北上表示欢迎；《民国日报》《时报》《京报》等媒体亦刊载了相关新闻报道及评论文章。一位署名“清波”者于《时报》署名文章，大为称赞孙中山的演说才能，并对孙中山“以平民资格”“为平民说话”的精神极为推崇。可见中山之形象与精神深得民心。

1924年11月22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等离开上海。令人遗憾的是，孙中山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溘然长逝，这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来到上海。

十日谈

明天请看“城市记忆”系列之孙中山在上海 责编：徐婉青

